



虚空与实在？——文、史、哲视野中的先秦思想文化

XUKONG YU SHIZAI?

WEN, SHI, ZHE SHIYEZHONG DE XIANQIN SIXIANG WENHUA

张立新 著



云南民族大学
学术文库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虚空与实在？——文、史、哲视野中的先秦思想文化

张立新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云南民族大学
学术文库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虚空与实在?:文、史、哲视野中的先秦思想文化/张立新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 11

ISBN 978-7-5161-0217-6

I. ①虚… II. ①张… III. ①先秦哲学-研究 IV. ①B220.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13982 号

责任编辑 郭晓鸿(guoxiaohong149@163.com)

责任校对 王应来

封面设计 格子工作室

技术编辑 戴 宽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3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1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4.75

字 数 251 千字

定 价 3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云南民族大学学术文库委员会

学 术 顾 问	郑杭生	孙汉董	汪宁生	马 戎	杨圣敏
	李路路	姚 洋	文日焕	陈振明	陈庆德
	彭金辉				

学术文库委员会

主 任	甄朝党	张英杰			
	和少英	马丽娟	王德强	张桥贵	
副 主 任	王四代				
	安学斌	尤仁林	李若青	李 骞	张建国
	高梦滔	孙仲玲	谷 雨	赵静冬	陈 斌
	刘劲荣	李世强	杨光远	马 薇	杨柱元
	高 飞	郭俊明	聂顺江	普林林	高登荣
	赵世林	鲁 刚	杨国才	张金鹏	焦印亭

《云南民族大学学术文库》总序

云南民族大学党委书记、教授、博导 甄朝党

云南民族大学校长、教授、博导 张英杰

云南民族大学是一所培养包括汉族在内的各民族高级专门人才的综合性大学，是云南省省属重点大学，是国家民委和云南省人民政府共建的全国重点民族院校。学校始建于1951年8月，受到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几代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关怀而创立和不断发展，被党和国家特别是云南省委、省政府以及全省各族人民寄予厚望。几代民族大学师生不负重托，励精图治，经过近60年的建设尤其是最近几年的创新发展，云南民族大学已经成为我国重要的民族高层次人才培养基地、民族问题研究基地、民族文化遗产基地和国家对外开放与交流的重要窗口，在国家高等教育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并享有较高的国际声誉。

云南民族大学是一所学科门类较为齐全、办学层次较为丰富、办学形式多样、师资力量雄厚、学校规模较大、特色鲜明、优势突出的综合性大学。目前拥有1个联合培养博士点，50个一级、二级学科硕士学位点和专业硕士学位点，60个本科专业，涵盖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和管理学9大学科门类。学校1979年开始招收培养研究生，2003年被教育部批准与中国人民大学联合招收培养社会学博士研究生，2009年被确定为国家立项建设的新增博士学位授予单位。国家级、省部级特色专业、重点学科、重点实验室、研究基地，国家级和省部级科研项目立项数、获奖数等衡量高校办学质量和水平的重要指标持续增长。民族学、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民族语言文化、民族药资源化学、东南亚南亚语言文化等特色学科实力显著增强，在国内外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学校科学合理的人才培养体系和科学研究体系得到较好形成和健全完善，特色得以不断彰显，优势得以不断突出，影响力得以不断扩大，地位与水平得以不断提升，学校改革、建设、发展不断取得重大突破，学

科建设、师资队伍建设、校区建设、党的建设等工作不断取得标志性成就，通过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传承文明，为国家特别是西南边境民族地区发挥作用、作出贡献的力度越来越大。

云南民族大学高度重视科学研究，形成了深厚的学术积淀和优良的学术传统。长期以来，学校围绕经济社会发展和学科建设需要，大力开展科学研究，产出大量学术创新成果，提出一些原创性理论和观点，受到党和政府的肯定，以及学术界的好评。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以著名民族学家马曜教授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就从云南边疆民族地区实际出发，提出“直接过渡民族”理论，得到党和国家高层领导刘少奇、周恩来、李维汉等的充分肯定并采纳，直接转化为指导民族工作的方针政策，为顺利完成边疆民族地区社会主义改造、维护边疆民族地区团结稳定和持续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作出了突出贡献。汪宁生教授是新中国成立后较早从事民族考古学研究并取得突出成就的专家，为民族考古学中国化作出重要贡献，他的研究成果被国内外学术界广泛引用。最近几年，我校专家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数量多，成果质量高，结项成果中有 3 项由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刊发《成果要报》报送党和国家高层领导，发挥了资政作用。主要由我校专家完成的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云南部分、《云南民族文化史丛书》等都是民族研究中的基本文献，为解决民族问题和深化学术研究提供了有力支持。此外，还有不少论著成为我国现代学术中具有代表性的成果。

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我国迅速崛起，成为国际影响力越来越大的国家。国家的崛起为高等教育发展创造了机遇，也对高等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2009 年，胡锦涛总书记考察云南，提出要把云南建成我国面向西南开放的重要桥头堡的指导思想。云南省委、省政府作出把云南建成绿色经济强省、民族文化强省和我国面向西南开放重要桥头堡的战略部署。作为负有特殊责任和使命的高校，云南民族大学将根据国家和区域发展战略，进一步强化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遗产的功能，围绕把学校建成“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高水平民族大学”的战略目标，进一步加大学科建设力度，培育和建设一批国内省内领先的学科；进一步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全面提高教师队伍整体水平；进一步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提高教育国际化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进一步抓好科技创新，提高学术水平和学术地位，把云南民族大学建设成为立足云南、面向全国、辐射东南亚南

亚的高水平民族大学，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学科建设是高等学校龙头性、核心性、基础性的建设工程，科学研究是高等学校的基本职能与重要任务。为更好地促进学校科学研究工作、加强学科建设、推进学术创新，学校党委和行政决定编辑出版《云南民族大学学术文库》。

这套文库将体现科学研究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特点。经济社会需要是学术研究的动力，也是科研成果的价值得以实现的途径。当前，我国和我省处于快速发展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中有许多问题需要高校研究，提出解决思路 and 办法，供党委政府和社会各界参考和采择，为发展提供智力支持。我们必须增强科学研究的现实性、针对性，加强学术研究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联系，才能充分发挥科学研究的社会作用，提高高校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力和贡献度，并在这一过程中实现自己的价值，提升高校的学术地位和社会地位。云南民族大学过去有这方面的成功经验，我们相信，随着文库的陆续出版，学校致力于为边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社会和谐稳定的优良传统将进一步得到弘扬，学校作为社会思想库与政府智库的作用将进一步得到巩固和增强。

这套文库将与我校学科建设紧密结合，体现学术积累和文化创造的特点，突出我校学科特色和优势，为进一步增强学科实力服务。我校 2009 年被确定为国家立项建设的新增博士学位授予单位，这是对我校办学实力和水平的肯定，也为学校发展提供了重要机遇，同时还对学校建设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博士生教育是高校人才培养的最高层次，它要求有高水平的师资和高水平的科学研究能力和研究成果支持。学科建设是培养高层次人才的重要基础，我们将按照国家和云南省关于新增博士学位授予单位立项建设的要求，遵循“以学科建设为龙头，人才队伍建设为关键，以创新打造特色，以特色强化优势，以优势谋求发展”的思路，大力促进民族学、社会学、应用经济学、中国语言文学、公共管理学等博士授权与支撑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并将这些学科产出的优秀成果体现在这套学术文库中，用这些重点与特色优势学科的建设发展更好地带动全校各类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努力使全校学科建设体现出战略规划、立体布局、突出重点、统筹兼顾、全面发展、产出成果的态势与格局，用高水平的学科促进高水平的大学建设。

这套文库将体现良好的学术品格和学术规范。科学研究的目的是探寻真理，创新知识，完善社会，促进人类进步。这就要求研究者必须有健全的主体精神和科学的研究方法。我们倡导实事求是的研究态度，文库作者要以为国家负责、为社会负责、为公众负责、为学术负责的高度责任感，严谨治学，追求真理，保证科研成果的精神品质。要谨守学术道德，加强学术自律，按照学术界公认的学术规范开展研究，撰写著作，提高学术质量，为学术研究的实质性进步做出不懈努力。只有这样，才能做出有思想深度、学术创见和社会影响的成果，也才能让科学研究真正发挥作用。

我们相信，在社会各界和专家学者们的关心支持及全校教学科研人员的共同努力下，《云南民族大学学术文库》一定能成为反映我校学科建设成果的重要平台和展示我校科学研究成果的精品库，一定能成为我校知识创新、文明创造、服务社会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的文库建设肯定会存在一些问题或不足，恳请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和广大读者不吝批评指正，以帮助我们将文库编辑出版工作做得更好。

二〇〇九年国庆于春城昆明

序 言

近年来，从官方媒体到大众网络，强调民族自尊、自信、自强的呼声日高，上上下下，似乎都有着一种“大国崛起”的冲动。但不必讳言的是，在这种种的呼喊声中，常常夹带着一些浅薄、浮躁的意识，甚或出现些哗众取宠、有忽悠国人之嫌的论调。从文化心理上说，一个人，或一个民族，在内心深处萌发自尊、自信、自强的强烈愿望，这是一件很可喜的事情，特别是对于近代以来心头常为失败主义的阴云所笼罩的中国人来说更是如此。可当我们更进一步透过外表的言辞深入其深层次的文化心理的时候，情形恐怕又不容乐观。值得深入讨论的问题是：民族自尊、自信、自强的呼声中包含着怎样的心理期待？我们怎样可以避免对民族自尊的诉求不落于坐井观天式的妄自尊大或由专制积习而来的唯我独尊？怎样可以避免对民族自信的呼告不流于自欺欺人的盲目乐观和自吹自擂？隐含在强国梦背后的心理预期是先哲孟子式“平治天下”的理想还是阿Q式的革命幻想？^①提出这样的问题，并非杞人忧天，语曰：“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不可不辨。特别是对于一个在政治上善于以标语和口号为宣传鼓动手段的族群来说，理性的思辨，实在不可缺少。

比如，在正常的人际交往中，说“是”或说“不”，即对具体问题表达肯定或否定的意见，那是最为寻常也似乎最为简单的事情，可一旦牵涉民族文化问题，或者说一旦我们把语言现象纳入民族文化批评的范畴，事情马上变得复杂起来。早先曾有一个颇为流行且有趣的说法，由中、西文

^① 孟子曰：“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在孟子看来，天下是否太平，要看上帝的意愿，但人是可以为世界的和平作贡献的。“平治”，作使动词讲。儒家理想是通过和平主义的路线使天下平治，不是战国后期“秦王扫六合”式的天下一统。阿Q革命经典的语录是“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欢喜谁就是谁。”有意味的是，《孟子》和《阿Q正传》都可视为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文本。

字传统的书写与阅读习惯牵附中、西文化的差异：西文是横排版，每行从左向右书写，读书人一边读一边摇头，似乎在说“no, no ……”；中文是竖排版，每行从上向下书写，读书人一边读一边点头，似乎在说：“是，是……”由此引申出一个结论来：中国人读书往往盲从，总认为书上所说的都是真理，而西方人读书往往秉持怀疑精神，总要从否定中去探求新知。由此再引申到中、西方人格的差异：中国人多奴性，故凡事主顺从，唯唯诺诺，唯上唯书；西方人尚自由，故富于挑战和叛逆的精神。当时听到这一说法，不觉会心一笑，因为那时正讲改革开放，是一个思想渴求自由的时代。北岛的“回答”言犹在耳：“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我不相信天是蓝的/我不相信雷的回声/我不相信梦是假的/我不相信死无报应。”

可世易时移，正应了中国的那句老话：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关于“说不”的话题也悄悄地发生着变化。如果“话语”确实在某种程度上表现着社会的走向，那么《中国可以说“不”》和《中国不高兴》之类的书籍的出版和热销是值得关注的文化事件。仅仅从书名就可以看出，作者着意要强调的不是理性的批判精神，而是一种中、西对立的民族立场和强硬的态度。姑且不论作者身后是否有官方背景（能代表中国说话，一定来头不小），如果这类书籍真如媒介所说的那样热销，而这种热销又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文化认同的话，那么，让人疑虑重重的是，改革开放之初对民族文化的反思已置换为对民族自尊的强调，而不少国民在心理上很显然是把说“不”或给人脸色看等同于自尊、自信和自强了。确实，在我们的经验世界中，能够对人说“不”，能够给人脸色看的人，似乎都是强势的人物；弱者面对强者，只能说“是”，只能委曲求全，即便恨得牙根痒痒，脸上也要挂着笑容。因此，我们也就很容易把有胆量对着干或给人以颜色反过来视为一种强大的标志。如果我们对民族尊严和民族强大的期待如此，那么，我们比之于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实在并无什么长进。^① 这里有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中国人把竖排版改革为横排版，读书时不再点

^① 阿Q因为喝了两碗空肚酒，“便又飘飘然起来。不知怎么一来，忽而似乎觉得革命党便是自己，未庄人却都是他的俘虏了。他得意之余，禁不住大声地嚷道：‘造反了！造反了！’未庄人都用惊惧的眼光对他看。这一种可怜的眼光，是阿Q从来没有见过的，一见之下，又使他舒服得如六月里喝了雪水”。在土谷祠跳动的烛光下，阿Q想象革命成功的光景：“这时未庄的一伙乌男女才好笑哩，跪下来叫道：‘阿Q，饶命！’谁听他……”（参阅鲁迅《呐喊》，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129、131页。）

头而是摇头，但这并不意味着怀疑的精神由此而生。阿Q们剪去辫子，穿起洋装，喊几声革命或造反的口号，甚至说一口流利的洋话，也并不意味着就是真的觉醒，真的懂得人的尊严和力量的来源。其实，孔子和耶稣的告诫是应该记住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要别人怎样待你，你也要怎样待人”。因此，对于一个真正获得人的尊严且有足够自信的人（或民族）来说，重要的问题不是可不可以说“不”，对什么人说“不”，而是对什么问题说“不”，为什么要说“不”。

也许有人会说，《中国可以说“不”》和《中国不高兴》之类的书因其缺少学术含量，某些说法甚至让人觉得近乎痴人说梦或不知所云，故而不值得我们花时间和精力去深入讨论，我们完全可以把它视为一个玩笑，可是，依笔者的感觉，近年国内主流学术在讨论到与中、西文化交流相关问题时的某些话语，明显表现着与那痴人说梦者相同的文化取向。比如关于“文化霸权”，“文化的输入与输出”，“文化渗透”，“失语症”，等等，其着力点首先就在于对民族立场的强调。与此同时，是国学热、是尊孔读经，是祭黄帝陵……中国人似乎急迫地在寻求民族文化的皈依和认同感。就在这样热闹的气氛之中，中国的学术似乎已悄然转向：文化自守与维护的观念正取代文化开放和更新的理念而成为学术的主流。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坚持中国学术研究中的文化批评，或者说，坚持民族文化的自省，就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了。

然而，学术主体如果真的具有尊严与自信，就不应该放弃话语的权利。学术不应该染上“审时度势”，“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的势利与投机。如果我们相信学术自由是学术的生命，那么，学术主体的自由意志，他对自身学术判断能力的自信，他对话语权利的珍视，是极其重要的东西。一个严肃学者内心所关注的，永远应该是问题本身。说“是”还是说“不”，都要出自诚实无欺的心灵。这里让我想到南宋诗人姜夔的一段话：“不求与古人合而不能不合，不求与古人异而不能不异。其来如风，其止如雨，如印印泥，如水在器。”他强调的是做诗的自然与真实，同时也强调了诗人作为独立的审美主体的重要。做诗如此，文化的研究和接受不也应该是这样的吗？所以，一个是学术的主体性，一个是民族文化自省的意识自觉，在我看来是很重要的东西，任何时候都不可以丧失。而且，对于一个人或一个民族来讲，是否具备自省的能力，也是衡量他思想上是否生长成熟的重要指标。《庄子》文中的黄河之神（河

伯)，原本“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在经历了远游之后，他获得了自省的能力，认识到了自身的浅陋。没有人认为河伯因此而失去自尊，恰恰相反，河伯形象的出现标志着庄子认识论所达到的博大境界与深刻的程度。所以民族的自尊、自信、自强与自省相生相连。要自尊，先自省；要自强，先自省。自省并不妨碍自信，恰恰体现着自信。文化批评，就是我们民族的自省，为的是不要再让我们民族在精神上陷入井底之蛙的可笑处境。

如果我们预设学术的研究将有益于社会的健康生长，它在很大意义上应该成为社会进步的强大动力，那么中国学术本身的健康生长就是一个极重要的问题。而中国现行学术体制下的学术现状却不容乐观，不久前网络上一篇《论文已死，学术将亡》的文章，曾引起热议。试想，如果中国学术的命运真的不幸而被文章作者所言中，后果会是怎样的呢？^① 所以，你要想成为一个真正的文化学者，你就得关心学术的生命，因为学术的生命就是你的生命。你得思考一些对于学术来说可能是生死攸关的重要问题。首先，关于学术导向的问题。如果学术是一种有思想有生命的东西，它当然应该有思想的导向。但学术导向并不是要由谁来给研究者画定一个框子，说你只能在这个框子里讲你该讲的话。学术导向更多表现为学者内在的心理机制：我为什么要来做这一研究？我对问题的关切点在何处？就中国当代的学术背景而言，中国现代化问题曾经是一个极重要的关切点，还有就是民族复兴的问题。我猜想主流学术在使用这两个术语的时候可能有很大的区别，在某种意义上说可能是针锋相对的。因为就一般的思维逻辑来说，强调中国的现代化，是以承认中国的落后（非现代）为前提的，就意味着要摒弃固有中国文化中与现代化不相容的东西，以一种积极主动的态度融入全球化的浪潮之中去；而强调民族的复兴，则以民族文化认同为前提，它更多意味着向自身传统文化的复归，从传统中寻找民族强盛的思想资源。就我个人来讲，我更愿意将二者理解为并行不悖。中国的复兴，绝不应该是回归某些历史学家和文化学者所津津乐道的康乾盛世或汉唐风采。如果中国真能和平崛起，那也一定是在它义无反顾地走上现代化之路的途中。然而对于现代化，人们其实又有着不同的心理预期。就目前

^① 中国农村改革历程中的安徽小岗村事件曾载入史册，为人所津津乐道，但如果我们想到这个事件背后中国学术的阙如，心里又别是一番滋味。

可见的情形来说，所谓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西方主流意识所主导的。要走现代化之路，你可能得首先认同西方主流文化一些重要的价值观，比如自由、民主、人权、平等之类。^①但也有在中国很有学问的学者预言，未来的世纪是中国的世纪，预言中国传统的文化将主导世界文化的走向。所谓风水轮流转，难说这文化的霸权哪一天就落到咱们中国人手上了。但凭什么呢？凭上帝的旨意吗？说这话的人不信上帝，自然不属先知之列。在我看来，这都是民族自尊心在作祟。从民族的自尊心出发，我们希望中国文化主导世界，换句话说来讲，就是想要世界变化成中国的样子，想让世界人民像我们中国人一样的生存。那么，在这几千年的文明史中，我们中国人是怎样生存的呢？这种生存方式是不是让我们感到很幸福？要回答这一问题，就离不开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自省。这样，自然要牵出文化研究的第二个重要的问题：学术立场。你站在什么立场上讲话？你在为谁张目？这是我们常可听到的质问。在斗争哲学的熏陶中长大的几代中国知识分子，似乎难以跳出凡事分清敌我、画清界线、站稳立场的思维方式了。笔者一向认为，如果不打破这种画线站队的思维方式，中国就不可能有真正的人文科学。在这个问题上，我比较赞同法兰克福学派的意见，因为他们倡导文化批评，但同时强调知识分子的“公共”身份。“公共”，意味着超越阶级，超越族群，超越性别，等等，亦即通常所谓世界主义的立场和眼光。超越并非漠视，而是要比狭隘的阶级观念和民族观念站得更高一些。这就如同老子讲“上德不德”，并非不要道德，而是要比道德更高；墨子讲兼爱，也并非如孟子指斥的那样无父无君，形同禽兽，而是要求人格平等，大爱无疆。我们以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对民族文化进行反思，当然首先是出于爱：我们爱这个民族，我们希望它成长得健康强壮，而且，我们是这个民族的一分子，对民族文化有着切身的感受。即使如鲁迅那样对同胞“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我们也能感受到爱的激情。当然，文化批评和文化阐释又是一件主体性色彩极其浓厚的事情，故而历来也颇多争讼，见仁见智，在所难免。但只要有大爱，有诚实的态度，争执就有益而无害。这就又引出了我所认为的文化研究的第三个重要的问题。

文化批评必然要触及社会变革的深层问题，潜含着社会改良的诉求，

① “五四”一代学人揭起民主和科学两面旗帜，开始了中国艰难的现代化之旅。

这也是它的意义和价值所在。但以往我们所看到的文化论争，常有大而化之、概而论之的通病，而对具体文化现象的研究和阐释却远远不够。比如讲文化选择时的“体用”之争，“全盘西化”之争；讲文化成因时的地理环境决定论或历史必然性。讲中、西文化差异时更有诸多概而论之、似是而非的观点，即使是很著名的文化学者也存在这样的问题。手边有一本钱穆先生的《中国文化史导论》，著于20世纪30年代，50年后作者在九十七岁高龄时对此书作了修订后再次出版。弁言中坦言：“当时因在后方，书籍不凑手，仅作一空洞意见之叙述。”在《修订版序》中又说：“迄今四十六年来，余对中西文化问题之商榷讨论屡有著作，而大体论点并无越出本书所提主要纲宗之外。”可知这部书虽如作者所言有点“空洞”，却是代表了作者几十年不变的对于中、西文化的意见的。在此书中，钱穆把中国文化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是先秦时代。天下太平世界大同的基本理想，即在此期建立，而同时完成了民族融和与国家凝成的大规模，为后来文化衍进之根据。第二，是汉唐时代，在此期内，民主精神和文治政府，经济平等的自由社会，次第实现，这是安放理想文化共通的大间架，栽培理想文化共通的大园地。第三，是宋、元、明、清时代，在此期内，个性伸展在不背融和大全的条件下尽量成熟了。文学、美术、工艺一切如春花怒放般光明畅茂。

若照中国文化的自然趋向，继续向前，没有外力摧残阻抑，他的前程是很鲜明的，他将不会有崇尚权力的独裁与专制的政府，他将不会有资本主义的经济上之畸性发展。他将没有民族界线与国际斗争，他将没有宗教信仰上不相容忍之冲突与现世厌倦，他将是一个现实人生之继续扩大与终极融和。^①

早就知道钱穆是国学大师，心向往之。但说实在的，读到他对中国文化发展趋向所作的概括，还是让我感到很诧异。这不仅是因为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深受鲁迅、胡适那一代人的影响，更因为我近年在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过程中，对中国传统文化也有较多的关注和思考，并也在尽力

^① 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修订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203、204页。

去寻求传统文化中具有现代意义的思想资源。^① 可中国文化自然发展的美好前景，我为什么就看不见呢？况且，说西方文化的成就偏重自然科学，而中国的文化偏重人文科学，所以中国这个“举世唯一的农耕和平文化最优秀之代表”，在其“固有文化机构里所最感欠缺的，是他们自然科学一方面”。中国社会之改进，只要有了“新科学新机械之装备与辅助，使其变为一崭新的大型农国而依然保有其深度安足感，实不仅为中国一国之幸，抑于全世界文化前程以及举世渴望之和平，必可有绝大贡献。”对于这样的观点，怎么看也觉得像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老调子，心下不免疑虑重重。但钱穆先生强调说：“欲改进中国，使中国人回头认识自己已往文化真相，则为一绝要之项目。”又说：“除却历史，无从谈文化。故应从全部历史之客观方面来指陈中国文化之真相。”他认为像《左传》那样的大史书，可以让我们直接了解那一时代的文化真相。对于这一意见，我是十分赞成的。正是基于与钱穆先生相同的想法，我近年对先秦文学的研究，渐渐从《诗经》、楚辞、诸子文而及于历史散文，而且整个研究过程一直是着眼于文化批评的视角。随着研究的深入，我越来越认识到，要认清中国传统文化的真相，不仅需要比较，而且确实需要做文、史、哲的综合性研究。当我们把民族传统文化理解为是“一种生活方式”，而我们对民族传统文化的考察又不是来自现实的社会调查，而是来自古代典籍的时候，这种综合性的研究更显得重要。因为我们既然要认识一种文化之真相，就应该对这种文化的诸多要素都予以关注。而且，从文化区分的角度上说，经典文化与世俗文化是应该同样关注的。一般来说，经典文化和世俗文化代表着民族文化中理想主义和现实人生的两极。就中国文化的状况而言，儒家、道家、墨家的经典著述总体上反映着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理想，而法家的著述和史家的历史叙事则表现着现实人生利害关系的精明算计以及生活的冷酷，诗人的吟唱则更多是理想与现实矛盾冲突的心灵苦闷。你要是只看一面，那就不完整，就不是“真相”。在这里我要特别提到司马迁和他的《史记》。司马迁是汉代文化视野最为广阔的知识分子，一位伟大的史学家、卓越的文学家。而我以为司马迁对中国历史或中国文化的伟大贡献，就在于他高度关注历史中的人，关注人的生存境况和命运。司马迁说他写作《史

① 拙著《神圣的寓意——诗经与圣经比较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先知的智慧——比较视野下的先秦思想文化精华》（上海学林出版社2004年版）就曾着力于探求中国传统思想的现代意义，以求中国传统思想与世界文化的交流与沟通。

记》的宗旨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他是想用自己的眼光去探寻隐藏在历史表象背后某种带有普遍意义或具有规律性的东西。但是，司马迁并没有把历史解读为“必然性”的教条，在他的笔下，历史中的人，鲜活可感。所以，中国古代的史家著述，不仅《左传》是大史书，《史记》更是大史书。还有《国语》、《战国策》等，都是我们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时应该关注的。研究文化，就是要研究人的生存状况，与历史必然性无关。历史必然性也好，自然环境决定论也好，都漠视历史中人的自由意志，把文化的主体放到了次要和屈从的地位上去。所以，更准确地说，除了关注历史中的人，你无法了解中国文化的真相。

就一般文化演进的逻辑来说，如果一种文化形态不因特别的原因而中绝，而是得以传承或绵延，而这种文化本身又有着自我完善与修复机制的话，那么这种文化形态的发展就会具有不断新生的活力，其文化理想也有可能在此世的人生渐次得以实现；而一种文化形态，它的生命虽然得以延续，但却如江河日下，渐次显现腐败与衰落的迹象，文化理想与社会现实总是相去甚远，甚至背道而驰，则这种文化形态必定在大的方面出了问题。中国传统的文化属于哪一种情形呢？要回答这一问题，就不能“空洞”。不能大而化之或概而论之。我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回归经典，还原历史。只有回归经典，你才能真正理解先哲的人文理想；只有还原历史，你才能了解中国社会的真实境况。

正是带着上面所说的我对学术的基本信念，我开始了可以称之为经典阅读与文化阐释的工作。结果就是读者面前的这本小书。我不敢确定我所作的阐释是否就是中国文化的真实，我可以确信的是我内心的诚实。此书如果有幸能与读者相遇，我希望他能见证我的诚实。

式微式微，胡不归？
微君之躬，胡为乎中路？
式微式微，胡不归？
微君之躬，胡为乎泥中？

——《诗经·邶风》